

和平心理学：愿景与走向

陈永涌^{1,2}，霍涌泉¹

(1.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2. 青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 和平心理学是二战以后崛起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其目的是运用心理学知识，化解破坏性的冲突与暴力活动，创造积极的社会条件，提高人类公平正义感和生活质量。和平心理学的发展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而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其理论范式也在不断地演变。在后冷战时代，和平心理学已成为未来十年处理人类压力问题的关键领域之一。

[关键词] 和平心理学；理论范式；行动策略；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 B 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4)01-0122-06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但是，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恐怖活动、霸权主义等不安全因素依然持续存在，严重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和平发展事业。如何化解冲突和暴力，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一直是世界上爱好和平事业的各国人民面临的头等大事。诞生于二战以后的“和平心理学”便是一门研究如何化解冲突和暴力的新兴学科。在后冷战时代，有关“和平心理问题仍然是未来十年处理人类压力问题的关键领域之一。”^[1]和平心理学在维护和平安定方面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在心理创伤的评估与治疗、预防与社区发展的支持等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针对性。

一、和平心理学的崛起

和平心理学是“研究威胁人类安全的心理根源、和平心理发生过程的科学，以实际生活中的人类和平行为、经验为研究对象，以预防与减少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发生，寻求和平化解冲突的方法，达成和平化解冲突的结果，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提升人类尊严与幸福、实现社会和平为目的的科学”^[2] (P1)。这门新兴学科的宗旨是运用心理学知识，化解破坏性的冲突，创造积极的社会条件，

提高人类公平幸福与正义感。和平心理学已被视为是一门“攸关人类生存的科学”。

和平心理学起源于对战争的关注，当时人们只关心怎样去阻止战争。第一个和平心理学家当属著名学者詹姆斯^[3]，1906 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这一概念，为后来和平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4] (P62)。詹姆斯认为战争给人们提供了表现自我牺牲及自我荣誉的机会，为了结束战争，必须找到“道德等价物”这一深刻而重要的人类品质。从此，“道德等价物”这一概念进入了现代语汇之中，成为揭示战争背后深刻的心理动机的有效话语之一，以提醒人们应该怎样避免军事冲突。

第一股和平之风出现于二战末期。1943 年，13 位知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发表了“心理学家宣言”的倡议书，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战争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生的，并强烈要求促进和平的政策法律制定者，应当关注全世界普通民众的根本愿望。此后，社会心理学家们参与到了战争问题的研究中来，他们对冲突产生的情景提出了新的理解，并思考怎样改变情景以创造和平状态：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便指出，战争会在忽视对手的力量中逐步升级，冲突双方的沟通交流会成为减少敌意与偏

[收稿日期] 2013-10-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研究”(10YJAXLX007)

[第一作者简介] 陈永涌 (1984—)，女，青海互助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青海师范大学讲师，从事心理学研究

见的关键；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则试图说明冲突双方的交流，在何种前提条件（如合作的相互依赖、同等的地位、当权者的支持）下是有效的这一问题，并认为崇高的目标会导致各种交流合作的可能。也即是说，冲突双方的利益目标只有经过共同的努力方可达成一致，而积极的相互依赖可以把冲突转化为合作。

冷战危机对和平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危机制造了笼罩全球的核毁灭恐惧，但也为和平心理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1961年，许多关于“心理学与核时代的方针”的文章在著名刊物《社会事务》杂志上陆续发表。不少文章由当时颇具名望的学者所撰写，如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等人提出的一些观点和问题，至今仍在和平心理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像“美国和苏联需要彼此视为镜像”、“有步骤与互惠性的行动（或者称为GRIT，一种估计对方敌意与欺骗的方法）”、“信任与不信任的相互作用”、“对优势和劣势的理解是怎样导致有共同威慑力的政策”等观点，影响了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在越南战争期间，许多类似的观点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如《误解与越南战争》（1962）、《国际间行为：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分析》（1965）和《对外方针的心理学维度》（1968）等论著，反映出了与早期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具有明显差异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和平问题的分析研究从个人行为转向国家控制；二是心理学家们开始强调对战争做好预防而非准备；三是先前的研究试图与政府的政策方针达成共识，而最新的研究却总是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和平心理学研究需要寻找新的行动策略。到20世纪70年代，和平心理学的文献资料显著增加，有上千种关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报告出现在专业刊物《和平心理学》上。

第二股和平之风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许多高层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对核战争恐慌的意识日益增强。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政治心理学的文献涉及到了和平心理学问题，像怀特编辑的论文集《心理学对核战争的阻止》一书，便对促进和平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篇名为《超越威慑》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来改善国家关系的概念化框架，被学术界视为是促进了和平心理学理论范式发展的重要文献；政治学家Wagner和Rivera（1988）等人发表的《心理学与和平改善》一文提出，不仅要把和平状态看作是没有战争，而

且要用积极的词汇将和平描述为“基于人类需要满足的人民和国家合作的长期进程”^[5]。1991年，美国心理学会的和平心理学分会（APA第48分会）成立，这是和平心理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和平心理学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了后冷战时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安全问题在局部地区构成了新的威胁。和平心理学研究已被卷入到威胁人类和平问题的新事务中，包括国际军事冲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以及未成年人的攻击行为。目前，西方国家的和平心理学研究关注的议题是多元化和全球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地理背景下的敏感性、有关暴力与和平的类型的多样性等问题，重视如何促进群体间的积极关系来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平心理学研究的一大任务是如何理解和阻止恐怖主义活动。受到地方历史地理背景的影响，南半球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倾向于追求社会正义来共同维护和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压迫和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影响着当地人的生存、健康和发展问题。同时，全球化运动也加剧了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人民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发展。多样性与全球化问题汇成了后冷战时期和平心理学研究的新焦点。

二、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受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和平心理学的发展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其理论范式和框架也在持续不断地演变。

冲突理论模型是和平心理学研究的早期范式，也是和平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一理论包括现实群体冲突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绝对剥夺理论等类型。

1. 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一个人与其他人在认知、情感上出现不相容性便会产生冲突。因此，冲突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在现实群体中，人们为了争夺稀缺资源（如水、耕地、稀有矿产等自然资源），最容易产生敌对性的冲突。同时，外来人口的增加与转移，也会加剧现实主义的群体冲突。对群体间资源的争夺总是伴随着知觉的扭曲，某一群体获取资源的努力会被另一群体视为冒犯和攻击性的行为。这些冲突常常会演变为暴力甚至战争。Winter和Cava认为，“暴力事件常常嵌入在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中。”^[6]

2. 相对剥夺理论。美国学者达沃斯等人提出，

即使不是为了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冲突也会发生。例如,某一群体对其生活水平与另一群体加以比较,经常会引起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敌对行为。在德国分治时期,东德的年轻人总是排斥西德人。与之相似的是,在南非的后种族主义时代,白人青少年总是倾向于对黑人消极、敌对的行径^[7]。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自然也会深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偏见。如果一些国家失去了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优势,而另一些国家获得了利益,就会刺激不公平感,进而加剧群体之间的冲突。

3. 绝对剥夺理论。绝对剥夺理论认为,绝对的剥夺比如严酷的经济剥夺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研究证明,绝对剥夺往往是导致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直接原因,像历史上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种族的镇压、柬埔寨以及阿根廷的大规模杀戮悲剧的发生,都是绝对剥夺理论的典型的事例。

上述冲突理论普遍强调群体利益差异对社会认知、人类尊严和幸福感的影 响,揭示了暴力现象是引致社会不安定的现实根源,进而催生了和平心理学对暴力问题研究的新转向。

近年来,针对消极和平问题,加尔顿等人提出了积极和平的多维理论模型(A Multilevel Model of Positive Peace Processes,见图1和图2)^[8]。他们对暴力现象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新的阐述,认为和平的范围不仅超越国家和地区,也涉及个人、家庭、邻居、社区和其他场所。暴力是对正义、安全和团结的破坏,更是对人权的践踏。加尔顿把暴力划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这样三种类型。根据他的观点,直接暴力主要表现个体间的欺负现象和有组织的战争行为,具有蓄意性、情境性和工具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对人的身体、生命和幸福感的直接伤害活动。结构暴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建构活动。与直接暴力有所不同的是,结构暴力始于社会组织 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如一些人被赋予了特权,可以有物质的或政治的影响力,而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存发展权利。这种暴力相对来说是难以改变的,具有社会性的合法性,往往表现出对人类幸福感的慢性伤害。文化暴力是一种与结构暴力相关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指社会文化领域中所存在的观念、信仰和思想等意识形态范畴,常常能够刺激或强化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活动。例如,“正义战争”这样一种文化观点,在一定条件下便有可能支持直接暴力活动,并为结构暴力充当合理性辩护的根据。

性辩护的根据。

加尔顿在对暴力现象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对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与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这样两种对策加以区分。所谓消极和平是指努力地减少直接暴力,而积极和平是指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减少阻碍和平进程社会的、种族的、性别的、经济的和生态的障碍。也就是没有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1996)。他认为,保持和平、制造和平和构建和平可以逐步地使暴力向非暴力转移,即(保持和平)→解决冲突(制造和平)→社会变革(构建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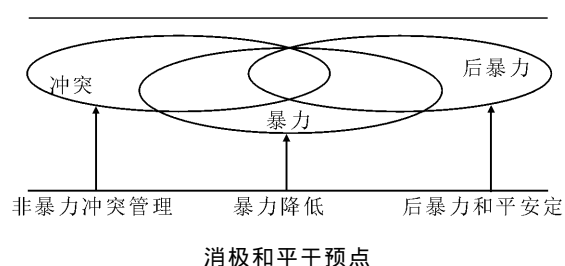


图1 消极和平理论模型

图1为消极和平的理论模型。在图1的上方从左往右示意图中,第一个椭圆形描述了冲突关系,即不可调和关系的存在事实。冲突椭圆形与暴力椭圆形的交叉重叠部分,意味着冲突关系可以演变为破坏性的行为,或者说可以转化为直接暴力。正中间的椭圆形标示着被直接暴力所充斥的状态,当然也可以转向非暴力的冲突关系状态。第三个椭圆形显示出后暴力状态,其虽然处于非暴力水平,但却可以发展为冲突观念或是暴力行为。这一模型说明冲突、暴力与和平三种状态可能会周期性地发生。

加尔顿建议使用“积极和平”这一术语来建构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积极和平理论模型”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内外不平等结构的调整与改变。^[9](PP. 461—547)如图2中所示的那样,冲突、暴力及后暴力状态这三种关系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消极和平常常是以偶然事件的关系为前提,而积极和平观念则强调持久的和平需要多层面的干预、整合。消极的和平趋向于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而积极的和平将挑战现有的结构。加尔顿提出,和平政策的制订者和实践者需要积极干预被战争蹂躏的社会地区,重视社区发展建设与心理创伤治疗,构建系统的和平发展工程。持久的和平不仅要祛除暴力的直接原因而且要处理问题的结构性和文化性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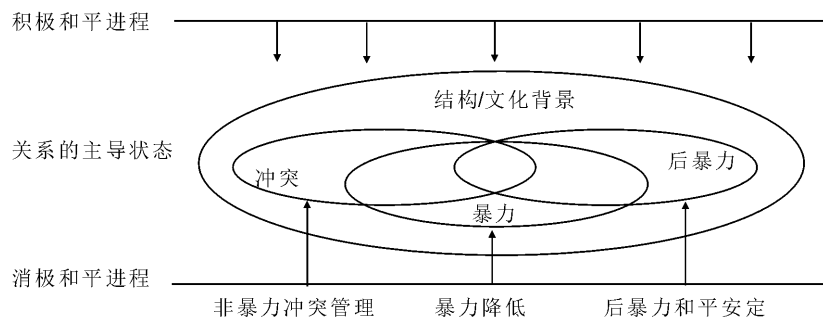


图2 积极和平理论模型

三、和平心理学的行动策略

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使得理论行动起来，乃是和平心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十年来，许多西方研究者总结出了一些和平心理学的行动策略。

1. 冲突解决的技术策略

一些和平心理学家认为，关于冲突解决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寻找“综合的解决方法”，即通过谈判、调解、仲裁、外交、合作性问题解决、单边性的主动行动等技术手段，寻求能够符合冲突双方需要的结果。常见的冲突解决方法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利益的解决策略，一类是基于需要的解决策略。

基于利益的策略是由 Fisher 在其著作中提出的。这种方法主张通过原则性的谈判，唤起群体间共鸣与相互理解，避免相互指责，产生符合双方利益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应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解决冲突方案是否符合各方的利益，进而使冲突双方能够在深层利益中找到解决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方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原则性的谈判”会产生创造性的选择和双赢的解决方法，通过相互学习与问题解决提升双边的关系。^[10] (P19)

基于需要的策略亦称“互动式的解决问题方法” (Interactive Problem Solving, 简称 IPS)。这一策略方法常用来解决直接的暴力，通常的参与者由国家 and 群体中的非官方代表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学者或是有威望的公民，互动式的解决问题方法可以促进冲突双方的相互理解，加强群体间相互联系，缓解根深蒂固的两极分化情绪。由于与会者并不代表各自的政府，因而所达成的协议是不受限制的。但是，由于这些与会者多具有崇高的地位和社会声望，所以在解决冲突和暴力事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态度，而且也可以改变政治团体的意见倾向，化解利益矛盾，促进社

会和解。^[11]

2. 暴力的处理

虽然和平心理学家对暴力和冲突有严格的区分，但是冲突可能是直接暴力的前提。一旦行为演变为暴力，就会阻碍和平发展的进程。譬如对其他群体的消极错误归因、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民族主义的加深，经常使得对立双方的建设性对话举步维艰^[12] (P162)。而成功地维持和平将会转化、消弭潜在的争斗、减少直接的暴力，并且使冲突双方开始致力于满足彼此的需要。同时，随着冲突的发展，直接的暴力活动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实施和平方案的最佳时机。

3. 应对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近十年来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造成恐怖活动的根源主要是贫困的生活条件、不安全感、缺乏自主权和社会身份的贬低等问题。因此，许多西方和平心理学家提出，需要通过改善教育、经济和政治环境，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可以改善生活条件、提升自主权 and 安全感，而教育工作则可以帮助人们学会尊重别人。

4. 心灵的修复

在全世界范围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部分暴力事件都发生在国家社区内部及其周边地区，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平民。因此，基于社区的暴力活动日益受到了和平心理学研究的重视。健康个体和社区的发展相互依赖已经为和平心理学与社区心理学家所关注。一些社区的暴力活动总是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影响涉及家庭成员、邻居和朋友。当前，和平心理学家日益意识到，社区建设不仅要恢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且需要防止群体心理暴力的循环发生。修复心灵创伤便成为和平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功能，特别是需要对青少年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使年轻一代学会如何减少攻击

性，增加同情心和亲社会行为，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5. 促进公共对话

为了促进和平，进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通过对话，冲突各方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理解他人的情绪、经历、观点和价值观。通过这样的对话，开展相互学习，加深个体和群体间的信任和理解程度，冲突各方就能重新建构自己，扩展自己，逐步地理解、接受、包容他人。

四、和平心理学的挑战与未来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强，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和平心理学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危机。

首先，和平与战争的对峙及隔阂。和平心理学的发展虽然对世界的稳定与暴力冲突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证据表明 20 世纪许多热衷于侵略的国家包括美国，在战争中失掉的往往比得到的要多，但是在当今国家实力极不平衡、军事竞争加剧、强势国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以及全球化带来新的不公平的形势下，和平理念显得相当软弱和苍白无力。和平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一种真正的和平就是和平要处于尊重人类权利的基础上”^[13]。但是，和平不是祈求来的，战争需要通过战争来消灭。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讲，“和平”话语听起来很动听，实际上处于易损害、天真和理想的状态，有时甚至是一种危险信号。尤其是当恐怖主义威胁成为美国最优先关注的问题时，有关和平问题的研究容易被指责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行动”，和平心理学家们的工作更难以被人理解甚至遭到误解。尽管和平心理学家确实倾向于支持竞争关系中以合作和政治途径解决暴力和冲突问题，但是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西方国家和联合国框架协议下的有关决议和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暴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很明显地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宗旨相悖。当然，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和平的声音是否软弱，而是需要在适应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建立积极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关系。

其次，和平心理学的传统理念正在面临着变革

与调整。和平心理学兴盛于冷战时期，许多理念和行动策略集中关注于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的研究。随着苏联的解体，公众对核战争的关注日益减少，而转向了对恐怖主义、气候的变化和地区不稳定秩序的关注。近年来，和平心理学家们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暴力的结构性与文化上的根源，研究暴力发生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同时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不是采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国际问题。这表明从冷战时期至今，和平心理学的理论范式不断处于调整和改变之中，因而对和平心理学形成规范性的理论框架和行动策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前和平心理学家们日益接受了多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不过这种表层的多元主义而本质上的实用主义政治科学观，有可能成为一种粗糙的、误导性的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无法为和平心理学提供高瞻远瞩的核心思想。此外，目前的和平心理学也缺乏清晰的概念和实践手段，加上社会上存在的种种误解，已经阻碍了不少人对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视。

第三，和平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平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暴力冲突与战争问题的科学，在研究方法上依赖于定性方法，而难以运用定量和统计的方法，因此许多人常常认为其科学性不高。虽然近年来有学者开展了一些以实验为基础的文化科学领域的研究，显示出和平心理学的研究开始重视实验方法，但是，实验研究很难成为和平心理学发展的主流范式。与所有的科学准则一样，和平心理学的研究有赖于归纳主义，多层次分析已经显示出一种有用的证据。未来的和平心理学需要发展出更好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变革与发展中的和平心理学尽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及阻抗，但其在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中显露出自己的独到之处，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平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最初的仅限于解决战争与军事冲突，发展到今天涉及个人、社区、工作场所以及国内和国际问题。几乎只要涉及到人的问题，均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和平心理学发展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领域，并有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积累、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系统。不少政治学家也意识到了心理学与政治进程间建立联系的价值。未来的和平心理学必将在国际事务、地区冲突、社区和工作场所等领域扮演着更为活跃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 Smith, M. B.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peace: A half-century perspective [J].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999, (5).
- [2] Christie, D. J., Wagner, R. V., & Winter, D. D. (Eds.) Peace, conflict, and violence: Peace psych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2001.
- [3] Deutsch, M. William James: The first peace psychologist [J].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995, (1).
- [4] Rachel M. Macnair. The Psychology of Peace: An Introduction [M].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 [5] Wagner, R. V., Rivera, J. Psych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peace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88, (2).
- [6] Winter, D. D., & Cava, M. M. The psychoecology of armed conflict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6, (1).
- [7] Finchilescu, G. & A. Dawes. Catapulted into democracy: South African adolescents' socio-political orientations following rapid social change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8, (4).
- [8] Koopman, S. Let's take peace to pieces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1, (30).
- [9] Johan Galtung.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M]. London: Sage, 1996.
- [10] Fisher, R. Getting to yes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1.
- [11] Kelman, H. C. Evaluat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eractive problem solving to the resolution of ethnonational conflicts [J].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008, (4).
- [12] Kimmel, P. R. Collateral damage: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war on terrorism [M]. Westport, CT: Praeger, 2006.
- [13] 张湘一, 刘邦春, 陈锡友. 世界和平愿景: 西方和平心理学的理论述评 [J]. 心理研究, 2012, (4).

The Peace Psychology Development and Its Challenges

CHEN Yong-yong^{1,2}, HUO Yong-quan¹

(1. College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PRC;

2. School of Education,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8, PRC)

[Abstract] Peace psychology is a sub-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that emerged after World War II. Its purpose is to use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to resolve the destructive conflict and violence, to create a positive social condition, and to improve human sense of justic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a psychology of peace,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the various periods, has different focus, and its theoretical paradigm is constantly changing. In the Post-Cold War, peace psych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areas in coping with human pressure problems in the next decade.

[Key words] peace; peace psychology; conflic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王明丽/校对 维佳)